

百 科 小 叢 書

最近國際政治小史

周 鯁 生 著

土 雲 五 主 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小科百

史小治政際國近最

著生鯁周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之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本及上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燬及書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另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四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七二六)

百叢書 最近國際政治小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周 鯁 生

主 編 者 玉 雲 五

發 行 兼 印 刷 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地 商務印書館

最近國際政治小史

目次

導言·····	一
第一章 最近國際政局變動之關鍵·····	一二
第二章 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之成立·····	二八
第三章 武裝平和·····	四〇
第四章 美國之加入國際政治·····	五四
第五章 歐洲政局及於遠東政局之影響·····	六三
第六章 歐戰與巴黎和議·····	七一
結論·····	七九

最近國際政治小史

導言

(一) 國際政治研究之必要 人類社會中，有許多事變，自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偶然發生的，其實他們都有很深遠的原因。所以論這些事變的原因，可以說有兩種：一種是近因，他一種是遠因。嚴格說起來，近因只可說是那事變的導火線，惟有遠因，纔算是事變真正的原因。尋常的人看事，大抵只看着近因，而不曉得追溯遠因。於是他們看過了事實的真因，對於前後接起的各事變中間，不能求出一個正確的因果關係。那麼，無怪乎他們有見事不明的謾語，對於許多事情，想圖補救，也不曉得如何找出個適當的方法。現代科學教育發達，比較的受有充分教育的人，纔知道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事物的現象。他們曉得以精確的觀察，澈底的考定事物的真相，推求事物的前因後果。因此，上

面所說的那種誤解事變的原因的毛病，也就可以減少許多。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所以稱做科學的時代，也不一定單是因為科學本體的發達進步，實在可以說是因為科學的方法，廣用於一般事物之觀察考究上。尤其是所謂社會科學，漸次發達，世人把科學的方法，應用到人類社會現象的研究上，因此發見出來的所謂社會律，也就很有實際的效用。因為明白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世人對於社會生活組織上應與應革的事宜，纔有個指針。我們可以說科學的研究，有助於近代的社會改良不少，并且也就是今後社會改造上必經的初步工夫。

但是可惜這種科學的研究之應用，從來多限於一國以內的社會現象上，而對於國際社會的現象，則迄今很少應用此種研究的。一般人以為國際關係，遠不如國內事情之直接於本身有切膚之痛。於是對於本國以外的事情，對於國際生活狀態，視為無關緊要，不肯加意去考究。這樣的疏忽態度，在閉關時代，猶可說無害；到了現代人類交接頻繁，國際生活複雜，社會連帶關係，由國內社會推及於國際社會，那樣的態度，就不對了。平時不研究國際事情，昧於世界大勢，一遇國際關係上有事變發生，莫能窮其原因之所在，總不免把近因看同遠因，誤認事變的導火線為事變的真因。比方

千九百十四年的歐戰發生，表而上起因於奧匈帝國皇儲的暗殺案；究竟這是不是歐戰的真因哩？恐怕世界上除了極少數精通外事的專門家以外，一般人的眼光，大都不能出最近直接事變的範圍；而於歐戰發生以前數十年來歐洲列強間，不安定的關係，錯綜紛糾的世界政局，真構成戰禍的遠因者，罕有能瞭然於胸中的。這種情形，在歐美教育發達的國家，固然如此，至論到我們中國，那更是不要說了。一般人長此不明國際事情，那麼，不單是他們自身對於甚麼叫做國際關係的改善，甚麼叫做世界和平的建樹，決不能想出個甚麼好的方法，就是別人立出了適當的計畫，也難使他們懂得的，難使他們贊助的。

歐戰結果，世界飽嘗戰禍，豈不是人人都說希望世界長久和平嗎？但是世界和平，不是可以空口說得成的，是要大家設法去組織的。欲立出一個完善的和平組織，那麼，從前破壞和平的原因，和此後保障和平的方法，就要先有個系統的研究。我們屬於人類一分子，爲人類全體謀平和福利，求世界新組織，是我們研究國際政治的第一個目的。

再有一層，就是我們要做一個資格完全的國民，也有懂得國際政治的必要。有了歐戰的大教

訓，世界上的人，豈不是都覺得祕密外交很危險？都鄙棄官僚式的外交，爲不能代表國民意志嗎？改革論的人，豈不是說要實行國民外交，要嚴重監督政府的外交政策嗎？但是要實行國民外交，要實行監督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有一個至不可缺的條件：那就是國民必須有外交常識。此處所謂外交常識，並不是說國民要懂得外交的儀式程序，而是說國民對於外交關係對於國際政局，要具有最小限度必要的知識。假使一國國民，始終像以前的樣子，對於外事一點兒也不懂得，又怎麼能講國民外交，怎麼曉得監督政府？就這一層說起來，凡爲國民，平時都應該注意國際政治。所以爲養成國民的外交常識，是我們研究國際政治的第二個目的。

再有一層，也是同等重要的。推廣科學研究的範圍，增加人類知識，可以說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個要素。以科學的精神，觀察國際關係事實，推究其因果關係，其所得的結果，不無資於人類知識之增加。社會科學，向來偏重在國內社會生活現象之研究，今當實行擴張其研究範圍於國際社會關係。然則實行擴充社會科學自身之領域，是我們研究國際政治的第三個目的。

最後再有一層：就是現今世界交通發達，經濟關係密切，社會連帶相依的關係，不單存在於一

社會以內，並且適用於此一社會與彼一社會相互間；因此國際關係一有變動，動輒直接影響於社會內個人的生活，所以要想個人的生活活動，能較適應國際社會情勢的轉移，就應當平時對於國際關係事情，預有研究。試看歐戰發生以來，我們國內的事業，有好多因戰事興旺的，亦有許多因戰事消沈的；甚至有的人在此數年中，忽而獲利，忽而破產，那豈不是國際事變，影響個人生活的一個好例證麼？可憐的是有許多人，事業忽然興盛，也不明白真因在那裏，事業忽然失敗，也莫知其所以然。這樣盲目的生活活動，聽天由命的主義，是最危險的，是不容生存於二十世紀競爭劇烈的經濟世界的。現今要使個人生活活動能適應世界的情狀，那麼，世界知識，是不可不具有的。所以養成個人生活上必要的世界知識，是我們研究國際政治的第四個目的。

研究國際政治的必要，大致已說明白了，我們現在且進而略述現今對於國際政治研究的趨勢。

(二)現今研究國際政治之趨勢 國際事情，也不是從前就全沒有人去研究他。不過研究這等事情的，限於一極有限的範圍中人，他們研究的目的大多注重在職業上的作用，很少出於上面

所說的一般的目的。這個範圍中的人，第一就要算外交家。外交家的職務，在解決對外關係問題，他們因為職業上的必要，自然要通達國際政情。所以各國真有本事的外交家，是沒有平日不考究世界大勢，沒有不留心國際政局的。我說真有本事的外交家，就是把他們和一般平凡的外交官區別。因為論理凡屬做外交官的人，都應該通曉國際關係，但是事實却大不然。在歐美各國外交官中，也有許多單是一個平凡的官僚，對於世界政治的知識，並沒有素養。至若論到我國的一般外交官，那麼，是更不要說了。其次研究國際事情的人，就是在新聞記者階級。把世界政治消息，傳達於社會公衆，本是新聞的一個重要職務。所以在歐美新聞界，就有一小部分的新聞記者們，專以探報批評國際事情爲己任。這些人以職業上的關係，自然平日對於世界政治問題，積有研究。最後再有一個小階級的人，研究國際事情，那就是世界上最少數的熱心平和主義運動之人。這些人抱着世界平和主義，要常常考究國際戰爭的原因和維持世界平和的方法。那麼，國際政治的研究，自然是他們分內的事，實在他們也很能盡他們的本分。從前世人對於國際關係問題，若是偶然能得點真相，大部分就靠着這些熱心家的宣傳。因為外交家的知識是守秘密，是與公衆不相干的；新聞記者的傳達，

又是帶着幾分色彩，不必全係實情的。惟有那些平和主義家，本着世界的眼光，爲公平的觀察，其結果發爲宣傳，比較確實而能得世人信用。最後尚有最少數研究歷史或公法的學者，間亦兼及於國際問題之研究。其研究之結果，發表於世，亦常能啓迪世人，不過其數極少而力量也很小的。

歐戰以後，世人對於國際政治的研究，漸示一個新趨勢。除上面所說的各階級人士以外，國際問題，尙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加入各方面的努力。現在且舉出幾個新事例來說明：第一是國際政治的研究，已入於學府，成爲專科。以前歐美各國大學，並沒有把國際政治當作一個專科研究的。歐戰告終，英國社會，很感國際問題之重要，於是有人捐輸巨款，在蒲利斯托爾大學，特設一「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之講座，聘一有名的國際政治學者主講。這件事在學術界上，確是創舉，也就可以徵現今對於國際政治研究的趨勢。再有一個事例，就是國際政治研究，已有國際的設備。歐戰停止以後，在比利時國都蒲拉塞爾，就有所謂「國際大學」之設立，國際政治的研究，是那大學中的主要科目。這個講學機關的組織，是在聯合各國大學教授招集世界各方面的學生，一堂講演；本國際主義的精神，討論國際一般問題。再有一層，就是素來熱心國際政治的學者，著述家，

對於國際問題，特別組織機關；或刊行雜誌，或刊布叢學。前者之好例，莫如英國戰時刊行的國際評論 (International Review) (現已停刊) 和戰後新刊行的雜誌國際事情 (Foreign Affairs) 英國有名的政治學者狄肯生 (Lowes Dickinson) 主持之下，發刊的國際小叢書 (The Swarth, mor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就是後者的好例。

就上面所舉的事例看起來，我們可以曉得現今世人對於國際政治的研究，比較歐戰以前情形，大有進步之象。研究的範圍既漸擴張，就是研究的態度，也趨於系統的，研究的方法，也傾向有組織的。我們想到國際政治研究之必要，就曉得現今這樣研究的進步趨勢，也是當然的，並且可惜那進步的程度，尚不能充分滿足我們的期望。

(二) 國際政治研究的範圍 對於國際政治，為系統的研究，本是現今初興不久的一個新傾向。換句話說，國際政治，是一個正待成科的新學科。這個新學科的研究範圍，是尚沒有十分明確的。所以我們於開始研究之先，就要自己劃定一個研究的範圍。

國際政治這個名詞，含義很廣漠。我們把他做研究的題目，本可以有兩樣的解釋。第一個是廣

義的解釋，依這個解釋，凡對於現存各種重要的國際問題，無論其屬於一般的關係，或局部的性質，加以分析的研究，探求解決的方法，都可以說是研究國際政治。換句話說，國際政治一科，就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事情。而在他一方面，則國際政治，又可作一個狹義的解釋；依這個解釋，研究國際政治，不是泛論一切現存之國際關係問題，而在研究國際社會連帶相依的關係，求一合理的互利的國際生活之方式。換句話說，國際政治一科，就是研究國際社會組織的原則。由第一個解釋，國際政治研究的對象，是現實的問題；由第二個解釋，國際政治研究的對象，是根本的原則。前者可稱為國際政治別論，後者可稱為國際政治原論。論研究的次序，不妨先從原論入手。因為國際關係上的現實問題，是無限的，而且是複雜的；要去研究他們，若是沒有認定幾個原則作指針，也是尋不出頭緒來的，更且不能下個解決的。世界政治的現象，國際關係的問題，不自全然各別孤立的，而是多少適用「連續之原則」，可求得因果關係的。先求得根本原則，而後應用於實際問題之研究，比較有一定的途徑可依，所得的結果，也許比較多點科學的價值。我們可以說國際政治別論，自有其特殊的目的，並且可以供給國際政治原論的資料；但是國際政治原論，帶有探求政治改造原則之重要使

命，而且做國際政治別論的一種導引，也是急要的。

國際政治的意義及其分類，已經明白，我們現在要定出一個研究的範圍來。籠統說起來，國際政治原論，至少要包括三大部分的研究。第一在追溯近代國際政局的變遷，推求過去各種重大事變的因果關係。第二在討論從來國際生活的方式，研究現在國際政治機關的組織。第三在分別國際政治上之各種理想主義，論其得失。換句話說，就是國際政治之研究，須兼及「已然」(It was)「現然」(It is)和「當然」(It ought to be)之三部。第一部可稱為國際政治之歷史的發達，或簡稱國際政治史；第二部可稱為國際政治之組織，第三部可稱為國際政治之思想。

至若國際政治別論的範圍，是沒有一定的。因為現實的國際問題，起滅無定，研究的對象，也可以隨時增減。我們但能就目前已有的問題，提出研究，以後遇有新事實發生，可再加以研究的題目。現在這些問題，已經不少。試舉出幾個重要的例來，如國際和平運動，國際裁兵計畫，萬國聯盟之改造，俄國政府之承認，德國賠款義務之履行，殖民地之委任統治，以及東歐小協商之組織，近東，平和之恢復，埃及之獨立，并其他各項局部的政治問題，都是有分別研究之必要的。每一個問題，可

以自成一個獨立的研究。國際政治別論，儘可以層出不窮，比較國際政治原論，他所要求我們的努力，就更大了。

第一章 近世國際政局變動之關鍵

研究國際關係，不能不以歐洲政局做研究的中心。歐洲的政治，是世界政治的原動力。因為美洲有力的北美合衆國，向來守他那傳習的孟羅主義，不肯直接干涉世界政局。此外各洲的國家，文化武力，多不及歐洲的國家，在國際政治上向來做歐洲政治的目的物，在外交上向來居於被動的地位。所以籠統的說起來，一般國際政局，都是從歐洲政局演成的。歐洲政治一有變動，影響就及於世界四隅。離開歐洲政治，可以說沒有獨立的國際政治之可言。講到國際政局的變遷，當然就要從歐洲的歷史說起。

近百年來，歐洲政治史上有三個極大的事變：第一個是拿破侖戰爭，第二個是德意志之統一，第三個就是上次的歐戰。拿破侖戰爭的結果，支配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歐洲政局。德意志之統一，就是直接逼成歐戰以前四五十年的國際政局，而與歐戰遠因有密切的關係的。講到近代國際政局

變動的關鍵，就不能不推這個德意志統一之大事。

世人都曉得上次歐戰的罪魁惡首，是那德意志帝國。這個德意志帝國是十九世紀中一個新組織的國家，究竟是從何時成立的呢？世人通常總說千八百七十一年普法戰爭結果，德意志統一告成。仔細考究起來，這個德意志帝國，並不是在千八百七十一年始產生出來，實在是從千八百六十六年普奧戰後，事實上即已成立。那時候奧地利被普魯士打敗，退出德意志同盟，普魯士乃聯合北部德意志的國家，組成一個北德意志聯邦，和南部德意志四個國家，結成攻守同盟。那就是德意志帝國成立的始基。到了千八百七十一年，南部德意志四國加入北德意志聯邦，不過就是就已經成立之德意志聯邦，再加擴大，完成他那民族的統一罷了。

照這樣看來，那千八百六十六年的普奧戰役，關係歐洲政治實在不淺。所以我們現在研究近代國際政局之變動，就要從這個戰役事情說起。

千八百六十六年之普奧戰爭，是怎樣起的？自表面上看起來，這個戰爭是因爲奧地利和普魯士兩國，爭史列色維格和爾斯台因（Schleswig-Holstein）兩州的統治權。這兩州原來是澳普

兩國合力向丹麥戰奪出來的（千八百六十四年）普魯士想併爲己有，奧大利於中作梗，而助長此兩州之自治運動。這項爭執問題，誠哉是普奧開戰的理由。實則戰爭的真因，尚不在此。普奧戰爭尚別有深長的意義存在。這就是在德意志同盟中最強大的奧大利普魯士兩國互相嫉忌，兩雄不并立，必壓倒其一而後了事；而陰險的畢士馬克抱德意志統一之目的，利在排除奧大利之障礙，蓄意一戰勝奧，實行組織新德意志帝國。所以那個普奧戰爭，是遲早必要發生的。問題是在發生的時期和戰事的範圍。史和兩州的問題，授畢士馬克一個開戰的好口實。但是普奧開戰，是否不牽動其他列強加入戰事，那就是一個疑難問題，對於戰局結果，很有關係的。那時候歐洲強國，能影響普奧戰事的，有三國，就是英俄法。英國那時與普魯士接近，而在自由主義勢力全盛時代，外交上以孤立自守，不積極干涉爲主義。俄普兩皇室亦很親善，加以俄國注目在近東發展，巴爾幹半島之侵略，不暇干預中歐問題。剩下的只有一個法國，確是野心勃勃，很想干涉普奧的爭端。實則中歐政局變動，在法國也很感利害關係，不能坐視的。

當時法國的統治者，是拿破侖三世。他從克里米亞戰役以後，威名震於歐洲；縱不能把法國稱

霸於歐洲大陸，也復不願再有第二國起來，與他抗衡。在畢士馬克之下，新興的普魯士勢力，大家都曉得不可輕視的。普墺開戰無論那一方大勝，支配全德意志，在中央歐羅巴，是出一個強大的國家，確是法蘭西地位的危險。所以普墺爭執史和兩州問題的時候，拿破侖三世，總想出來干涉，躍躍欲試。但是拿破侖三世已近暮年，沒有果斷的精力，加以墨西哥遠征失敗，勞師傷財，大傷法國國力。在中歐風雲緊急，國際政局搖動的時候，他爲左右親信各派意見所搖動，不能採定一個一貫的政策，決然執行。起初他本想向普魯士表示好意對於戰事守中立，而要求普魯士承認法國擴張領土，以爲普魯士戰勝的抵償。（法國意中想取彼此的土地，不外是盧森堡比利時等。）但是遇着了狡猾的畢士馬克，終久不得要領。拿破侖三世鑒於普魯士方面之無希望，乃轉而向墺意大利談判，令其答應退回威尼沙（Venetia）州於意大利，俾意大利守中立，不助普攻墺。（千八百六十六年四月八日普魯士和意大利已有先約，普魯士允助意大利由墺意大利取回威尼沙州，意大利允助普攻墺。）墺意大利方面，已經答應把威尼沙州退還意大利，只要他守中立；但是意大利首相拉瑪摩拉（Ta Mar- mora）終以意墺世仇，而意普有約，不肯如拿破侖三世之所提議。拿破侖三世既失敗於意墺交涉，

乃復訴諸舊來的計畫，召集歐洲大會，先商得英俄同意，立定草案，乃於五月二十四日，招請奧普意及德意志同盟派人到會，商議維持平和的方法，討論退還威尼沙州於意大利，處分史和兩州，改組德意志同盟諸問題，普魯士首先應此招請，意大利及德意志同盟，隨後亦承諾到會。但是奧大利忽然宣言（五月二十八日）奧大利到會，要附兩個條件，一個是：要招請羅馬法皇到會，他一個是：不得議及何項領土割讓問題。奧大利的這兩個條件，當然招意大利的反對，歐洲大會開不成功，拿破侖的計畫，乃卒不能不作罷。（六月二十四日）歐洲大會召集不成，在奧大利失去了維持平和的最後一個機會，自不消說，而在拿破侖那方面，也沒有達到出風頭的目的，那就更失望了。歐洲大會如果開成，巴黎做了解決歐洲問題的中心，拿破侖可執歐洲政局的牛耳。在這大會中，法國可以左右一切，不單是普奧兩方面，不許有一方面完全制勝，法國的權威，且將從此更增長。拿破侖這個計畫，本來不錯。畢士馬克明知之，而又不敢公然獨唱異議。所以一聽見奧大利提出條件，大會開不成功，他就喜得狂叫「我君萬歲，戰爭定了。」他這樣的幸災樂禍，不單是幸得一戰以制伏奧大利，達其鐵血政策的目的，更且因此免得拿破侖有利用大會增殖法國權威的機會。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不同之點；即聯邦組成之各邦，不惟如前日之有主權之獨立的，而實服從於一個中央政府之最高權力之下。換言之，則北德意志聯邦，不是一個同盟，而成了一個國家，成了一個民族的國家。但是這個民族的國家，究竟沒有民治主義的精神，沒有適用議院政府制，而是一個君主大權，官僚政治，軍國主義的代表。世人說新德意志組織的強處，在這一點，實則其危險處，也就在這一點。

北德意志聯邦的憲法，已預爲南部四國之加入，留了地步，這四國無論何時可以加入新組織，不致有修改憲法之必要。當時因爲外界阻力和南部諸國內部情狀，不容易得其即時加入；這些國家對於普魯士的關係，暫止於一個軍事同盟，對於聯邦全體關係，暫止於關稅同盟。然而畢士馬克之不能以此現狀滿足，且要進而把這四國拉入新組織，完成他那德意志民族大統一，新德意志帝國建設大計畫，那也是公然的祕密，世人所共想得到的。普魯士一躍而執北德意志之牛耳，已經搖動歐洲政局；若再擴張勢力，在德意志全土，建設統一的大國，屹立於中歐，那麼，依據民族的統一，兵力的強大，當然不免要在列強中稱霸，而破壞歐洲政局均勢。這種情形，是拿破侖看得出的。法蘭西傳習的政策，不許他人在萊因河彼岸，建立強大的國家，侵逼法國的優勢。拿破侖生息於這個傳

習中，對於新興的普魯士，大抱不安之念，也是不足怪的。畢士馬克要完成他的統一德意志雄圖，就不能不預備對付拿破侖的阻力，有不惜與法國一戰之覺悟。所以普奧戰爭，只能解決大問題之一部分；不拉克和約，只能看做一個暫時休戰。尙有一個更大的決戰，遲早必來；這個決戰，就不是爭德意志的霸權，而是爭歐洲的霸權了。

拿破侖處於普奧戰後新形勢之下，是不能安枕的。他雖屢次交涉失敗，曉得直接要得德意志的尺地寸土，是不可能；但總覺得他要持一個積極侵略政策，擴張法蘭西國境，纔可以博得法國人民歡心，保持他的權勢。所以地遇事就想乘機達到他抱的目的。千八百六十七年，就有盧森堡問題發生。當時盧森堡大公國已不在德意志聯邦內，這大公國的統治者之荷蘭王，有意把大公國全土出賣，拿破侖就出來承買。三月以來，祕密交涉，著著進行，以荷蘭皇后之力，卒有成議。但是盧森堡這塊土地，介乎法蘭西比利時普魯士三國之間，軍事上占極重要位置，豈可令法國取得消息一傳出，德國人激昂，畢士馬克公布其和南部德意志國家所訂的同盟條約以示威，軍界中人，公然唱開戰之說。拿破侖雖意在和平解決，而恐怕失此機會，見怒於巴黎市民，也就和幕僚討論法國兵力；但是

他據調查結果，曉得法國動員不過二十多萬，而高級將校，且形缺乏。所以一值荷蘭王因畏懼而撤回出賣盧森堡的同意，拿破侖也就承諾俄國的提議，把那問題提交列強公同處決；因為盧森堡大公國的地位，原來依據千八百十五年和千八百三十九年的公約決定的。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十一日，在倫敦定了一個和平和辦法。依這個辦法，拿破侖放棄關於盧森堡之一切要求；普魯士撤退在盧森堡境內的要塞守備兵；列強公同保障盧森堡大公國之永久中立。在這項外交爭執中，普魯士明明是占了勝利。因此之故，法國人對於德意志的敵愾心，更加強固兩國的關係，就一天一的壞下去了。

在普魯士方面，畢士馬克和毛奇（Molke）將軍龍（Roon）將軍之流，整軍經武，預備最後之一戰，推倒法蘭西，完成德意志統一。而在法蘭西一面，拿破侖和其幕僚，也曉得形勢之危險，要準備武力對待。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西班牙發生之王位繼承問題，恰成了兩國戰爭的導火線。同年西班牙國內有革命之變，女王伊沙倍拉出奔。翠年西班牙臨時政府中人，提議請一位和顯佐列魯（Hohenzollern）皇室的親王，名雷俄波特（Leopold）者，入承西班牙王統。在這個國際情狀之

下，再有一位普魯士王室宗親，統治西班牙，顯係增長普國勢力，破壞歐洲均勢；消息傳出，大招法國的猜忌，拿破侖表示反對，命其駐普大使，親向普王維廉，提出抗議。普王維廉已經表示不贊成雷俄波特親王就西班牙王位，而法政府內部之急烈派，必欲普王給一個將來不再令此問題發生之保障；普王憤怒，而有拒絕再行見法國大使之說，以其事件交畢士馬克處置。畢士馬克藉此以為挑戰之具，而有所謂耶姆司（Fras）之電報，耶姆司之電報，就是普王報告千八百七十年七月十三日他和法使會談決裂的經過情形，向畢士馬克發的。畢士馬克把電文的意省略，發表報上，使世人見之生誤解，以為法國受辱，因此挑撥法國人敵愾心，而使戰事沒有避免的進步。在畢士馬克用心，可謂乖巧險詐，而在法國方面的主戰派，也就振振有詞，氣燄不可遏了。七月十九日（千八百七十年）普法遂正式宣戰。

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之戰，表面上雖起因於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實際則種因尚遠，由已前所述普奧戰後兩國關係，已可明白。在普魯士方面，蓄意完成德意志統一，畢士馬克久伺時機，以除掉法蘭西這個障礙，西班牙問題，恰給他一個決裂的好口實。而在法國方面，則對普開戰，也是遲早必

要實行的事，其原因說來已不下三種：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北德意志聯邦組成，普魯士和法國爭霸歐洲勢不兩立。第二個原因，是拿破侖三世在普墮戰時守中立，沒有得着普魯士的報償，總不甘心。他想要收買盧森堡合併比利時，又都被畢士馬克反對，不能如願。第三個原因，是拿破侖三世做法國皇帝，原是用暴力做成的；他想利用法蘭西人好光榮，崇拜拿破侖一世武威的心理，對外打幾個勝仗，保持他的地位。拿破侖三世看見普魯士崛起中歐，他自己聲威漸落，國內反對派漸要得勢，恐怕自己的地位保不住，就要在外出點風頭，討好於國民，回復他的聲勢。在這種情勢之下，普法戰爭之發生，自是勢所必然的事。但不料到千八百七十一年兩國一經開戰，戰爭結果，對於法國那樣的壞，這也是可以說明的。就內部軍事上說，普魯士是新進氣銳的國家，軍事準備，亦研究有素；而法國則多年勞師遠征，國力已疲敝，加以國內情感不一致，政治腐敗，軍事上預備不足。就外面助力上說，則普魯士有全德意志的援助，不單是北德意志聯邦兵力，全為普魯士用，就是南部德意志，也加入戰爭，相助普軍。反是而法國則全然處於孤立的地位，獨力支持；因為英國既在自由黨主義得勢時代，不出來干涉；俄國則表好意於普，不單是守中立，並且聯合英國，勸丹麥中立勿動。開戰以前，拿破

命原想聯合意大利和奧大利兩國，組成一個同盟，合攻普魯士。這事本很自然，因為意大利之統一，原得力於拿破侖之援助不小，兩國皇室，又有親戚的關係；奧國則新敗於普，正要復仇。但意大利要求羅馬（時尚為羅馬法皇所占）而拿破侖為左右親信，羅馬舊教黨所左右，不能應意大利這個要求，那個法意三國同盟的計畫，就不成功。普法開戰以後，奧國仍未始無意獨力助法攻普，但他背後有一個俄國，掣他的肘，明告他須嚴守中立，否則俄國就要幫普國打他，他因此始終不敢動作。俄國在這戰事中，何以這樣的對法不利？第一因為俄皇亞力山大和普王維康，向來親善；第二因為俄皇看拿破侖三世由一平民稱帝，總是一個暴發富，要排擠他；第三因為波蘭問題，法國會對俄表示干涉的態度，傷了俄國的感情；加以克里米亞戰役的仇恨，尚留在俄國腦中，俄國所以寧願觀普勝法敗，不願他人助法。復次，就精神上說，畢士馬克雖實際是一個挑戰的人，但是表面上看來，拿破侖總居於首惡的地位。在德意志方面人人把這戰事看做一個民族統一問題，其氣甚壯；而在法蘭西方面，則內部意見紛歧，方針莫定，行動大不一致，也就是精神上的一個弱點。當時世界同情，翕然傾向普魯士，不利於法國，那是事實之不可諱言的。追溯這些情由，也就曉得普法勝負之數，已有一定。

戰爭結果，良非偶然。

普法開戰，南部德意志國家，合北德意志聯邦一致對法，拿破侖三世的軍事計畫，全然齟齬。四個禮拜之間，（從八月二日德法兩軍開戰，到九月二日拿破侖三世在塞丹投降，）法軍一敗塗地，拿破侖且身爲降虜，德軍長驅直入，直抵巴黎，法蘭西國運，隨拿破侖武運以俱危。在他一個人孤注一擲，事還小，法蘭西國民，受禍就大極了。巴黎城下之盟，（千八百七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預備和約成立，）畢士馬克提出苛酷之條件，強法人承認。德意志索得阿爾沙斯，羅連兩州，和賠款五千兆法郎，（佛蘭克福特條約，千八百七十一年五月十日，）硬想這一下懲死法國獨霸歐洲。法蘭西人經茲戰役，創鉅痛深，雖追咎拿破侖之誤國，然觀德意志之驕橫強暴，也就仇恨更深了。所以從千八百七十一年戰事結局，法蘭西和德意志兩國，成了不共戴天之仇，歐洲均勢動搖，政局大變；此後四十年來的武裝平和的局面，都從這裏種的禍根。

第二章 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之成立

普法戰後，歐洲大陸，局面一新。南部德意志四國加入德意志聯邦，完成德意志民族統一。巴黎攻下之十天，普魯士王維廉第一，在法國烏塞宮（即千九百十九年對法和約簽字處）正式宣告為德意志皇帝。（千八百七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從此以後，屹立於歐洲中原的強國，就不是一個單獨的普魯士，而是一個大一統的德意志帝國。換句話說，就是全德意志都已經普魯士化了。把這個全德意志的勢力，放在畢士馬克的手，供他自由運用，他的勢力，真是炙手可熱，沒有一個國家不感壓迫生疑懼了。普法戰爭間接的結果，完成意大利半島統一。因為戰時法國駐紮羅馬保護法皇的軍隊撤回，意大利兵即進佔羅馬，建為意大利王國首都；意大利人多年渴望的統一事業，乃告完成。戰爭的再一個間接結果，就是俄國恢復他在黑海的支配權，又得派軍艦入波斯華洛司海峽，侵逼君士坦丁堡。俄國這種自由，本是經千八百五十六年巴黎條約限制了的。他乘普法戰役，得了

普國的好意贊助，就公然宣言那條約的限制作廢，自由行動起來；締約國莫可如何，只有任巴黎條約被破壞，而以千八百七十一年之倫敦會議，立一個公約應該遵守之空洞的宣言，敷衍面子了事。俄國恢復黑海權力，就是近東問題再起紛爭的張本。從全體上看來，維也納會議（千八百十五年）建立的歐洲政局，到了千八百七十一年，全然推翻。這時候歐洲政治問題，已經不是這一個的王位繼承，或那一國的革命撲滅，甲民族的解放運動，或乙民族的統一完成，那些零星的局部的問題；而是新舊國家的勢力衝突問題，獨立的大民族對外發展，彼此爭霸的問題。

在這個新局面之下，畢士馬克主持新德意志帝國之命運，為國際舞臺上的中心人物。他的政策，可以左右歐洲局勢。從千八百七十一年以至畢士馬克退職的時候（千八百九十年）德國外交，總是主動的，其他列強居於被動的地位，這二十年之間的國際關係，可以說是全然受德國政策的支配。

畢士馬克收束普法戰事以後，最要緊的事，是在鞏固新統一的德意志之地位。他要鞏固德國在歐洲的地位，就不能不設法減少外敵，多植與國。換句話說，就是要在德意志勢力之支配下，組成

一個親德的結合。他曉得法國已成了世仇，是不能引爲友邦，并且長久不能相容的；英國在維多利亞治下，自由派平和政策得勢時代，是不會積極加入歐洲政治舞臺的。那時候可以望積極的德意志的與國的，惟有俄奧意三國。意大利的統一，普魯士與有力，那時候意德兩國也沒有利害衝突，是比較的容易拉攏來的。至於奧大利的聯絡，却是一個很難辦的事，這也極易明白的。因爲普奧向來，素來互相嫉忌，勢不兩立，加以普奧戰役的記憶方新，在奧大利方面，尙不免有復仇的意思，自然不容易使之親德。但是畢士馬克利用匈牙利人在奧匈帝國之勢力，以近東發展，餌誘奧國，而德奧妥協，遂得成功。最後講到俄國，那個帝國，向來和德意志沒有仇恨。普法戰爭的時候，俄國對普守友誼的中立，而取得破壞巴黎條約，恢復黑海權力之報酬；兩國皇室又特別親善，當然不難聯成一氣。有這樣的關係，所以發生一個所謂三皇聯盟，那就是德俄奧三國元首的團結。那個團結，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同盟，不過從千八百七十一年到千八百七十五年之間，三國的元首，交換訪問，時常會合，表示親善，對於國際問題交換意見而已。畢士馬克想利用此團結，做一個攻守同盟，對付外敵，尤其是對於法國，那是不可靠的。因爲奧國之加入這個團結，不過想藉此以與俄國妥協，得安然行其近

東發展政策，他并無仇視法國之意；俄國和德親善，也不必即是有心對法。所以畢士馬克想把這個三國妥協，變成三國同盟，不能成功，并且連這個妥協，都因為後來的國際事變，維持不住了。

在法國那方面，戰後創鉅痛深，但也很發憤圖強，不單是共和憲法安全成立，并且對於財政軍事改造計畫，著著進行。法國這樣的進步光景，就不免招德意志的疑忌。畢士馬克索得阿羅兩州，原想把法國弄得一蹶不振，眼見他漸漸回復元氣，增殖國力起來，於是又要施其侵逼手段；到了千八百七十五年，德國見法國下院通過增加軍備案，公然有對法用武的威嚇。可憐的法蘭西，初經戰敗不久，那能再和德為敵。幸而當時歐洲各國，都對法表同情，不直德意志之所為，尤以英俄兩國積極的起而為友誼的調解，其力最大。德意志意外的遇着這種干涉，就沒有達得欺壓法國的目的。法國因此得立足西歐，安然作休養生息之計；德俄感情，也就因之不免疎隔起來。

到了千八百七十八年的近東問題之危機，德俄壞三國妥協，就受了最後的打擊。奧俄兩國，都注旨在近東發展，利害衝突，終不能避。近東問題之重提，始於千八百七十五年。當時巴爾幹半島的耶教人民，不堪土耳其帝國的壓制，起來反抗。波斯尼亞赫洛仔果維那兩州人民首先發難，保加利

諸地方繼起。土耳其對這些反抗地方人民，大行虐殺。巴爾幹全局牽動，近東問題，惹起歐洲列強的干涉。俄國向來抱南下政策，想在巴爾幹扶殖勢力，乘這個機會，就向土耳其進攻，直逼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其力盡求和，於是訂有亞德里亞羅堡和約，把個土耳其弄得四分五裂。英國恐怕俄國在近東勢力擴大，有害英國印度通路；奧國原來也是要向巴爾幹發展的，自然很忌嫉俄國成功。於是英奧兩國，一致反對俄土和約，英國至示有不惜開戰的勢子。歐洲平和破裂，即在眉睫。畢士馬克來做調人，在柏林召集列強大會議，解決近東問題。其結果有千八百七十八年的柏林條約。在這個會議中，便宜都被英奧占去，俄國全功盡棄。奧國之取得波斯尼亞赫洛仔果維那兩州的治理權，就是在這時候。俄國宰相可爾查可夫以在柏林會議失敗屈辱，恨畢士馬克刺骨；他歸咎德國偏袒英奧，陷俄國於孤立地位。俄德感情，從此大壞。俄奧在近東勢力，衝突日烈，更不待說了。

說畢士馬克在柏林會議，對於英奧有所偏私，故意妨害俄國利益，究竟生於可爾查可夫私感，并不合事實。畢士馬克當時正在聯俄，斷無故意傷俄國感情之理，他自己當時確實對於近東問題，沒有野心，也如他自己所宣言的。但是俄國經此次會議失敗以後，就不信用德國，漸漸裏對德表示

敵意起來。對於德國輸入品增加關稅，在德國國境增加兵力。畢士馬克處茲地位，仍不想和俄國決裂，而盡力疎通兩國感情。不過俄國關係，就較之德俄感情更難補救，因為兩國利益衝突，在近東有不能兩立之勢。德俄三國妥協，再無成立之望。這時候畢士馬克就非就俄國兩國之中，選擇一國做與國不可。畢士馬克卒決定取奧國，實行聯結起來。在這個時候，奧國已明白他要在近東發展，俄國決然是他前途的阻力，不得不求一個後援，自然容易捐棄宿怨，決然和德國攜手。於是千八百七十九年，德奧兩帝國之間，結了一個同盟條約，他們自己說這個同盟，是一個攻勢同盟。德奧同盟條約，原來付之祕密。據這條約，德奧兩國中，任何一國，如受俄國攻擊，他們應當出其全力互相援助，講和也須兩國協同合意。如若兩國中有一國被外國攻擊，但這外國不是俄國，其他一同盟國應當守好意的中立；但如來攻之國，而得俄國援助，那麼，兩同盟國互相援助之義務，也就發生，當共同作戰，以至共同講和為止。這個德奧同盟產生，變動了歐洲均勢，就是後來三國同盟對待三國協商的張本。

畢士馬克組織了德奧同盟，尚不以爲足，想更進一步加入第三國，以擴大同盟勢力，因而鞏固

德帝國地位。他初想聯俄，後來曉得不成功，就轉而聯絡意大利。論理，意大利不至加入德奧同盟，與法作對。因為意大利人視奧大利爲世仇，且尙有許多屬於意大利人土地，受壓在奧國治下；意人天天運動恢復；而法國於意大利統一之業，則與有大力；并且同爲拉丁民族，情感相通。但是事勢有轉移一切關係的力量。拿破侖三世，駐兵羅馬，保護教皇者十年，令意大利不克奠都羅馬；第三共和成立後，法國國內舊黨，猶且常對羅馬教皇表同情，反對意大利，已經傷了意大利感情，而增意大利人疑懼。加之意大利注意非洲殖民，想把北非沿岸之突尼斯托里波里，併爲己有，畢士馬克又從中鼓勵他進行。但是同時法國也正抱有偉大殖民政策，經略北非洲。法原來有阿爾吉利亞做根據地，前在柏林會議，英國已經承認他擴張勢力到突尼斯，畢士馬克曉得法政府當局爵萊思菲列 (Julien Ferry) 抱積極的殖民的政策，也就想慫恿他進行，分其力對別一方面發展，免得他常常致思於歐洲領土之恢復；并且可利用法國殖民政策進行，與意大利在北非利益衝突，德國便可從傍獲利。果然千八百八十一年法政府動於英德兩國之鼓勵，就派兵佔得突尼斯改爲法國保護地。意大利人眼見他自己注目的地方爲法國捷足先得，對法國就立於敵視的地位。意大利因爲畢士馬克之運

動手段，久已漸漸與奧消釋意見，互相和解，對德奧同盟接近起來。今又遇着法國這樣的強橫，自知敵對不來，也就憤而求外援，聯德之心更切。所以畢士馬克拉攏意大利加入德奧同盟之目的，也就容易達到了。於是千八百八十二年，意大利就加入德奧同盟，而有名的三國同盟成立。

三國同盟成立，德意志帝國在歐洲之優越地位，更爲確定了。但是畢士馬克在這時候雖有防俄之心，究竟仍不敢敵視俄國。德意志一面組織同盟，一面仍是曲意和俄國要好，預防法國得和俄國接近。因此之故，俄德兩國元首信使往來，仍是不絕。俄皇德皇暗中立有妥協，約定彼此不相侵害。畢士馬克的計慮，可謂周到之至。此時畢士馬克想把德國勢力鞏固，獨霸歐洲，務必設計把其他列強勢力，引之向外發展，使他們彼此衝突，德國坐收漁人之利。於是慫恿俄國從中央亞細亞南下，鼓勵法國在非洲擴張殖民地，其結果則俄國在波斯阿富汗和英國衝突，法國爲突尼斯摩洛哥問題，和意大利交惡，爲埃及問題，和英國齟齬。因此弄得彼此不和，轆轤日多，無暇在歐洲大陸，和德國爲敵。甚至如意大利因爲爭非洲殖民地，以爲被法國欺負，就和德國攜手，同盟起來，產生德奧意三國同盟，已如上面所說的。那時候德意志帝國的勢力，在歐洲真沒有再堅固的了。這不能不算是畢

士馬克的政策大成功。

畢士馬克一舉推翻歐洲均勢，使德意志掌握霸權，在他那勢焰燻天的時候，已不免啓列強的疑慮反感，而無形中激動了一個對抗運動，趨於回復均勢的傾向。不過畢士馬克的政策，雖然狡毒，但仍是保守的。其意專在鞏固德帝國在歐勢力，尙沒有露出大勤遠略之野心，因而對面所起的反動，也尙不十分大。到了千八百九十年畢士馬克退職，德皇維廉二世親政，德國對外政策，大變起來。德國已不復以歐洲霸權爲是，他并要大事發展，在歐洲大陸之外，擴張勢力。他也不再和俄國繼續妥協，同時他的海外發展政策，漸漸和英國利益衝突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抗的勢力，就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

在千八百七十一年普法戰役，俄本暗中助普，但是戰後見法國敗到那步田地，新告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這樣的傍若無人，欺凌法國，他的同情，不覺漸漸的傾向法國方面，尤其是千八百七十五年普國威逼法國的時候，他竟公然和英國起來取干涉的態度。德俄感情，自然漸漸疎隔，柏林會議結果，德國招俄國的怨恨極深。中間以畢士馬克之苦心孤詣，維持德俄國交，幸得無事。今值維廉第

二變更政策，公然疎俄，俄國到這個時候，更覺得沒有和德國融洽的餘地。他就決然聯絡法國起來。俄國想對付新組織的德奧結合，惟有法國的援助，最爲有力的。并且以外尚有種種原因，有使俄國利於聯法的。一，俄國聽得英國有加入三國同盟的消息，他恐單獨勢孤，在東方敵英不過，俄英兩國在近東中東之利益衝突，前已說過的。二，俄國正計畫西伯利亞橫斷鐵道，需款經營，要仰給法國資本。三，俄政府因爲改良俄國兵器，要法政府協力幫助。而在法國那方面，受了千八百七十一年城下之盟的恥辱和損失，又鑒於戰後德意志之壓逼不已，和德國總是勢不兩立的，自然想找一個強國做與國，特爲後援。但是鄰近的英國，那時候尙對三國同盟表同情，且值格蘭斯頓沙利斯倍里等平和派執政時代，英國守他所謂光榮的孤立之政策，不願和大陸國家結甚麼合縱連橫的關係，法國自然沒有和英國同盟的希望。況且法國的殖民政策，又常和英國的利益衝突。所以法國也只有聯俄之一法。他不管俄國是一個帝政專制的國家，根本的和他的共和政治主義不對，也就和俄國一天一天的接近，共起禍患來了。以法俄兩國利害關係之相同，兩國政府向同一目的着着進行，俄法同盟，遂從千八百九十一年起成立。從這個時候，歐洲就有了兩個大同盟對立，一面有德奧意三

國同盟，他面有俄法同盟。國際政局，就漸漸的現出一個新均勢來了。

有俄法同盟和三國同盟對峙，歐洲的權力均衡，回復起來，德國的勢力，已就不能像前此那樣大了。到了十九世紀末年，新事實發生，國際形勢，更經一番變化。一面則意大利漸漸的和法國輯睦，經濟上兩國改訂通商條約，政治上兩國定有仲裁條約，及殖民地協定。依此協定，意大利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特權，法國承認意大利占取托里波里的自由。更有重要的事，就是英德關係疎隔，英國漸得對抗德國。他看見德國國力發展，海外膨脹政策，着着進行，近東經略，海上競爭，到處有傷英帝國利益。甚至南非戰爭的時候，德皇公然向杜蘭斯哇表示友誼，英德感情大壞，英國遂覺得德國是英國的大敵，非急籌對付的法子不可。加以法國政府自從急進的辣腕的政治家德格賽入長外交，始終持一抵抗德國的方針，對於他國，廣求聯絡，尤其是對於英國，情願遇事讓步，犧牲一切，以博得他的友誼。於是千九百四年，英法協約成立。這個協約，把英法兩國歷年關於殖民地（如摩洛哥、埃及）等）外交一切懸案，一筆了清，從此英法兩國，成一個新結合，對付德國，那就是公然之祕密了。英法協商成立，弄得德國不安，於是乎發生所謂第一次摩洛哥問題。（此事下章再詳說。）德國原想

藉摩洛哥問題，下手破壞英法結合，那曉得反把敵人的結合，更弄堅固擴大了。摩洛哥事變收拾之後，英法協約，不但是更加穩固，并且英國鑒於德國勢力之咄咄逼人，漸謀和俄國接近。因為英國認定英帝國的主敵，是這新興的德意志帝國，就要設法聯絡歐洲國家，把德國陷於孤立的地位。這個排德政策，英國前皇愛德華七世，主持甚力，他自己爲此事做工夫不少。至今德人記恨不忘，通稱做「包圍政策」(encircling policy) 這就是說他蓄意替德國四面樹敵，困之於重圍中。英國既抱定這個政策，就連素來積不相能的俄國，也要聯絡起來。加以法國介乎英俄兩國之間，從中斡旋解除，兩國妥協，更易進行，於是千九百七年遂結成一個英俄協商，把英俄兩帝國在中東的衝突解除，對於波斯西藏問題，彼此妥協。自這個英俄協商成立之後，英法俄三國，公然確切打成一氣，做一個排德的大團結。歐洲政治，表面上成一個三國協商對三國同盟的局面，實際上三國同盟中的意大利久已不大可靠，那個同盟，全靠德奧兩國的力來支持，歐洲的新均勢，於此完全成立。在這個均勢局面之下，兩面勢均力敵，誰也不敢輕於發難；表面上歐洲平和一時得以維持不破。但是實際所種的禍根，就更深遠了。

第三章 武裝平和

均勢局面下之平和，不是正當的平和，而是一個武裝的平和。在這種平和局面之中，即伏有禍亂的種子。平和之維持，全靠兩方面權力之平衡，換句話說，就是平和的基礎，置於武裝之上。雙方擴張軍備，以圖自衛。軍備愈張則疑忌愈深，種種陰謀暗鬪盛行，隨時皆有爆裂之患。這樣的情形，在三國同盟對三國協商時代，現得最顯明。三國協商成立以後，德國在歐洲已不能居於制霸地位。國際均勢回復，德意志權威漸落，外交上已漸失其主動的地位。反之法國及其他列強，外交上已不復長為被動的，駸駸乎有凌駕德國，為一切積極的活動之勢。在這種新局面之下，德皇就不自在起來。眼見得他的仇敵團結起來，形成對抗的新勢力，他就不能坐視其活動。若是想乘其毛羽未豐的時候，加以打擊。所以有千九百五年的摩洛哥事變。摩洛哥問題，在千九百四年英法協約中，已經對於法國為有利的解決。德國嫉忌法國成功，頓懷惡意，但因法俄同盟在先，英法又有新結合，一時慎重，不

敢遽起何種舉動。及至翌年三月，就決然發作起來。因為當時德國見法國內閣力弱，忙於內部政爭，而英國又在政變之交，德人以為新得勢力之自由黨於外交上當取消極政策；俄國困於日俄戰爭，新有遼陽奉天之大敗，必不能有助於法。於是德皇於千九百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摩洛哥之塘吉爾 (Tanger) 登岸，宣言願助摩洛哥王保持獨立。是明明對法示威，迫其改變外交政策，服從德國。法國驟然遇着這樣的形勢，全國震駭，歐洲殺氣頓起。德皇初料法國實力不足，外援無望，德國示威之舉，必然全達目的，可以一舉而破壞對手的團結。不知他這種專橫舉動，動了各國的公憤，就是他的同盟國意大利，也不直他之所為。新成之英國自由黨內閣，外交仍循前任方針，擁護英法協商，遇着這件事鬧起來，就極力的幫助法國，明白宣示態度，警告德人。德政府最後曉得自己勢孤，漸漸的退步，千九百零六年在阿爾吉拉斯召集一個國際會議了事。在這件事變中，法國雖然表面上受了屈辱，因為排德主謀的德格賽被德國迫出內閣，阿爾吉拉斯會議，循德國要求召集，法國加入會議，把摩洛哥問題交付各國公決。但是不僅世界輿論偏向法國表同情，就是阿爾吉拉斯這個會議的結果，也倒反有利於法國：因為法國在摩洛哥的經濟上的利益特權，正式經各國承認，實際的優越地

位，仍舊未變動的。所以這一次的事情，德國政策，實在失敗，徒然表白德國的野心蠻行於世界，倒把英法協商更弄堅固，排德勢力，更加擴大了。

千九百五年以後，歐洲形勢，頓呈變象。摩洛哥事件的結果，德國已公認爲搗亂的分子，惹起歐洲國家的不安，而以英國的不安爲尤甚。而在他方面，則向來和英國在東方相衝突的俄國，新敗於日本，已不能再爲害。英俄接近的機會成熟，千九百七年，結有上面所說的英俄協商。但是德國一面觀三國協商之大團結組成，敵國方面之勢日益擴大，而他方面則觀俄國在日俄戰爭所受的瘡痍未復，抵抗力尙微，就不免又想及時發動，趁三國協商的實力正弱之時，加以致命的打擊。恰值千九百八年近東問題復起，授德國以示威之機會，歐洲政局又瀕於危機了。

千九百八年的近東問題，由德國的同盟國奧國發難。我們記得千八百七十八年柏林條約，把波斯尼亞赫洛仔果維那兩州交給奧大利治理。那時候奧大利接管這兩州，着着行其奧化政策，蓄意併爲己有。但是這個問題很複雜，不容易解決。波赫兩州的人民，屬斯拉夫種。塞爾維亞以同種比鄰的關係，也垂涎這兩州，而有倡大斯拉夫主義，支配巴爾幹半島的俄國做後援。加之土耳其在名

義上猶在波赫兩州留有主權。論法理，他有收回這兩州的權利，值千九百八年土耳其革命，青年土耳其黨握權。奧大利對於波赫兩州的野心鼓動，他恐將來青年土耳其黨要求收回兩州；而目觀當時土耳其新革命之後，可以勢迫。於是決然以合併波赫兩州之宣言，公表於世。土耳其人聞之激昂，自不待說，但有尙有一個最失望的，就是塞爾維亞國。俄國看見奧大利這種強橫舉動，和他的大斯拉夫主義對面衝突。居然起來干涉，攻擊奧大利違背柏林條約，要求召集國際會議解決波赫兩州問題。英法兩國也對於奧國舉動，提出抗議，爲俄國的聲援。但是俄國的抗議，沒有實力作後盾，他的軍備財力，經了那個日俄戰役，已經現出弱點令人輕視。這種情形，都是奧國打算明白了的，所以膽敢出此突飛之舉。奧國對於俄國要求召集公會之議，敢於拒絕。俄國堅持原議，英法一致贊同。雙方相持不下，德意志忽施其雷霆萬鈞之力，壓迫協商國。德奧本屬同盟，奧國之巴爾幹發展又是德國所贊同的。今見他和俄國爭執，當然，要求幫助。并且尤有一層，他想藉此舉使俄國受辱，給三國協商以大打擊，以回復德國的威望，重握歐洲霸權。於是當奧俄爭持不決的時候，德國突然出來，示意絕對的助奧，貫徹其合併政策，不借用武。英法兩國，處此情勢，沒有爲俄國冒險之決心，而俄國實力不

足，也就不敢孤注一擲。其結果則俄國退步，奧國安然達其合併波赫兩州之目的，德國在外交上，獲一大成功。

波赫兩州問題如此解決，自然大損三國協商的威望，而張三國同盟（實則已成了德奧兩國同盟）的強權，德意志帝國，又駸駸乎有復獲歐洲霸權之勢。尤其是在近東方面，德奧勢力鞏固，德國東方發展之政策，着着進行，大斯拉夫主義，倒反慘淡無光。在德國這樣大勢力之下，俄國相形見絀，幾乎要和德國妥協起來。千九百十年，俄德兩皇，有波仔塘（Potsdam）之會見，關於近東問題立有協定。一時俄德接近之說，盛傳於世，三國協商，就很有危險的勢力。

這個歐洲政局，究竟尚不能使德國安靜。俄國雖說已不足畏，法國的勢力，卻是一天一天的前進，總是德國所不能容的。所以千九百十一年當法國有事於摩洛哥的時候，德政府又與風作浪起來，以演成所謂第二次摩洛哥危機。當時法國以平摩洛哥內亂爲名，也派兵進占首都菲仔（Fes）（五月二十一日）把摩洛哥收作保護國，德國雖在摩洛哥沒有直接的利益，他總不能容法國自由發展，這個宗旨，是他已經在千九百五年表示得很明白的。況且當時法國內部政爭方烈，社會不

安。而協商中之英國政府，在對外持消極主義的雷多佐治一派自由黨人的勢力下，英國國內，當時也有極大的政爭。兩國情形如此，必不敢和德國對抗。俄國那時候已經有親德傾向，也想必不至爲一非洲問題，替法國出死力。從德國人眼光看起來，那真是一個極好對法示威，侮辱協商的時機。只要顯出威嚇手段，就可懾伏法國，並不待實行用武，可以成功。於是七月一日德國駐法大使，通告法政府，說德國已派破艦龐鐵 (Panther) 赴摩洛哥 (Agadir) 保護德僑。這個舉動的意義很明白，就是示意是法國：他若不得德國同意，不能在摩洛哥取獨立的行動。這又不過是千九百四年的一劇，重演一遍罷了。德政府以爲一舉可以制勝，千九百八年之外交成功不難再得一次。殊不知他的打算大錯。法國遇着這個事變，即刻發揮舉國一致的精神，各黨均願犧牲黨見，合力對外。法政府對付德國的威嚇手段，態度強硬，全不退步。加之英國那時候看見德國那樣突飛的舉動，也就深感危懼，各黨一致，表示贊助政府，助法拒德，甚至當時以平和消極主義著名之雷多佐治，也公然宣言積極的援助法國。到了這時候，德國自知形勢看錯，計畫齟齬，對手的抵抗力，意外的堅強。德國當時國內情形，也就尙不足使他有決然開戰的勇氣。於是德國不能不掩旗息鼓，讓步了事。其結

果則德國正式承認法國對於摩洛哥之保護權，而法國割給德國以非洲東南甲湄龍一部領地。德國雖然擴張了一塊殖民地，但是他的原來示威的目的，全然未達。在這個第二摩洛哥事件，德國外交大失敗，是不能掩飾的。事後德國的報紙自認失望，極力攻擊外交當局之無能，對於德國勢力退落，表示不安。在千九百十一年夏季，德意志國民誠沒有開戰的決心，但是對於事變的解決，那就一般的大不滿意了。

千九百十一年的第二次摩洛哥事件，雖沒有鬧起戰禍，但是事變結局後，險惡的暗潮，仍是在國際政局裏面的。德國經此次外交失敗，沒有達得他的目的，當然不能甘心，只待時機，就要再發作起來。所以那時候歐洲全局，成了一個火山，時時都有爆裂之虞。恰值近東問題再起。國際關係，日見險惡，就真有岌岌不可終日的現象了。

近東問題，是歐洲政治上一個最錯綜紛糾的難問題，十九世紀以來，始終沒有圓滿解決，常常供各國政治家利用，做歐洲政局變動之導因的。一方面有土耳其帝國的腐敗政治，巴爾幹人種的紛爭；他方面又有抱有野心的列強，各為其本國利益計，干涉巴爾幹事情，近東問題，乃成不治之症。

千九百八年奧國合併波赫兩州，已經把近東問題重新提起。到了千九百十一年，意大利侵略托里波里，就居然開戰亂之端了。上面已經說過，意大利原來垂涎北非沿岸殖民地；但是當時埃及及在英國勢力範圍，突尼斯被法國奪去，剩下的只有一個托里波里，可以經營，幸而於千九百一年，得法國的承認，意大利就在托里波里，着着行其經濟侵略，想漸次收歸己有。自從青年土耳其黨革命得勢之後，以土耳其帝國領土保全爲己任，大有尺地寸土，不再任人奪取的氣概。意大利在這個時候，曉得托里波里不是可以平和得到手的，他看見青年土耳其黨新起，就不能不先下手。於是派兵強索托里波里，以有意土之戰。初時戰爭範圍，尙限於非洲，翌年就移到韃靼雷斯峽口及愛琴海上。這個戰爭，雖然是意土兩國的事，其目的在爭一個托里波里，但是其影響所及，就不免要牽動歐洲全局了，我們曉得意大利是三國同盟中之一員，而他在地中海上的利益，是和同盟國之奧國，大衝突的；意國侵占土耳其土地，戰禍延及土耳其歐洲領地，搖動地中海均勢，就引起了奧意大利的反對。在土戰爭中，意奧關係，極形險惡。并且三國同盟之領袖德意志帝國，正在近東發展，籠絡土耳其，當作被保護者看待，驟然看見同盟國的意大利，壓迫土耳其，他也就處於左右做人難的地位。在他一方

面，英法兩國在地中海，也有極大的利害關係，對於這個戰爭進行，也就注意監視。加以巴爾幹諸小國對土耳其，蓄有敵意，蠢蠢欲動，隨時皆可擴張戰域，弄得問題更紛雜，不可收拾。幸而土耳其以巴爾幹形勢危險，而意大利原來也只以取得托里波里爲目的，中間大約也得了德國從中斡旋，於是意土停戰講和，土耳其其默認，意大利占得托里波里了事。歐洲政局，沒有因此決裂。

但又不幸意土戰爭方告結束，那更大的，更危險的巴爾幹戰爭又接踵以起。巴爾幹地圖色彩，已經柏林會議，大改過一次，但是巴爾幹問題，并未根本解決。土耳其其政治的腐敗如故，新立的諸小國，又各有其擴張勢力的野心，垂涎土耳其領土，衝突不絕。尤其是保加利着眼於馬塞頓州，塞爾維亞垂涎羅維巴札（Novi Bazar），希臘要求恢復庫列特（Crete）島。這些問題，都成了土耳其和巴爾幹諸小國國際關係上懸案。到了青年土耳其黨執政，就以對外強硬自命，表示絕不讓步。巴爾幹諸國，看見他們對土要求，沒有妥協的希望，就想趁早下手，索性弄個一勞永逸。在意土戰爭中這些國家，已經着手聯絡，預備一致對土。加以希臘內閣總理爲有名的政治家威尼佐洛氏，他揮其辣腕，組成巴爾幹同盟，執半島的牛耳。乘意土戰事纔了，土耳其軍力疲敝的時候，他們正好對土耳其

下一個最後的打擊。加以千九百十二年夏間，馬塞頓州之大行虐殺。激怒保加利人。各國民急於要解放在土耳其治下的同族，把那件事看做一種民族的神聖戰爭。到了十月，土耳其和保加利塞爾維亞希臘交涉決裂，所謂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發生。在這個戰爭當中，土耳其敵人方面之聯軍，除保塞希三國兵隊外，尚有門的內哥羅國的兵隊。聯軍連戰連勝，一切都能如預定的計畫進行。到了十一月，土耳其其主力全破，君士坦丁堡瀕於危險。在這個危險的時候，土耳其國內發生政變，青年土耳其黨失勢，後繼政府，即時求和。十二月三日，休戰條約成立。但是青年土耳其黨仍堅持繼續戰爭，千九百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在宮庭中起革命，迫土耳其其皇帝再任主戰派，組織政府，談判中止，戰爭再開。亞得里亞羅堡被聯軍佔領。土耳其其政府，知大勢已去，二月中，即祕密和列強交涉，請其出任調停。四月中，雙方停戰議和，因有倫敦和議（因和會關於倫敦）之解決。依此解決，土耳其歐洲領地，除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帶地域外，悉以割讓於巴爾幹同盟國（但阿爾巴尼亞交給列強處分），但是巴爾幹戰事雖了，而同盟國戰勝分肥，不能滿各人的欲望，內部裏就發生爭端。塞爾維亞垂涎的阿爾巴尼亞，因為奧意兩強，均垂涎其地，以謀控制亞得里亞海之故，列強把他組成了一個獨立國，

勉強置於一個德意志王族統治之下。保加利要求的馬塞頓，又爲塞爾維亞希臘分佔。戰勝國各抱不平，殺機大動。加以巴爾幹戰爭，已經牽動歐洲全局問題。土耳其是德奧所暗助的，同盟國中的塞爾維亞發展到亞德里亞，是奧國所最忌的。同盟國則得三國協商之同情和助力，尤其是塞爾維亞之發展，有俄國作後援，爲大斯拉夫主義的先鋒。戰事中已經露出兩面對敵的形勢，巴爾幹戰爭，無異是德奧和三國協商的暗鬪。土耳其其敗得那樣地步，出乎德奧意料之外，尤其是德國看見他所培養的土國士官，代爲組織的土國軍隊，不能抵敵法國式的聯軍，覺得失了德國的威望，不免惱羞成怒。所以幸災樂禍，惟恐天下不亂，同盟國內部分裂，是他所最暗喜，且樂得而利用的。所以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之發生，起因於德奧之從中挑撥不少，而其戰爭結局之壞，也多半是他們故意逼成的。

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的發難者，是保加利。他因爲對土戰爭，出力最多，而不能獲得素所希望的馬塞頓，於是決意訴諸武力。六月二十九日保加利軍突然向塞爾維亞希臘開始總攻擊，他以爲一舉可以懾伏這兩國。殊不知希塞兩國，早已結了攻守同盟，預防保加利攻擊。所以保軍一動，他們就反攻。保軍以力當土軍，久戰疲敝，不能再敵希塞兩國聯軍，節節敗退。（在戰爭中，土耳其軍進攻奪

回亞得里亞堡。加以羅馬尼亞在中途加入戰爭，進逼保都，保加利四面受敵，再不能支。七月三十日休戰條約成立，五交戰國的代表，集於羅馬尼亞首都蒲加雷斯特開和議。八月簽字之蒲加雷斯特和約，成於羅馬尼亞威力之下，大不利於保加利亞。馬塞頓諸重要地方，都由希塞兩國分去，土耳其收回亞得里亞堡，而對於羅馬尼亞且割去國境一段地土。保加利前功盡棄，恥辱莫大。羅馬尼亞在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原來站在巴爾幹同盟之外，守中立，此次何以忽起來干涉？因為他原來要向保加利亞索取接境之一段土地，做中立報酬，沒有如願；且恐保加利打敗希塞兩國，在巴爾幹稱霸。但是羅馬尼亞這一出來，弄得巴爾幹問題更紛亂。羅馬尼亞雖然一時乘機獲大利，他招保加利的忌恨，就深的了不得。保加利自這次敗辱以後，和巴爾幹諸國，勢不兩立，漸就依附德奧，且因德國以接近土耳其。那個千九百十三年，的蒲加雷斯特和約，就自己伏下了破壞的種子。

巴爾幹風雲，如此急激變化，是列強所共感痛切的利害關係的。倫敦和議不成，大傷列強的威望。尤其是協商國的威望，因為和局是協商國所希望，而在英國政府主宰之下，於倫敦開議的。但當時英法俄三國內部，都有弱點，無意有事於外，只求巴爾幹戰事結束，平和早克復，不至牽動大局，即

令巴爾幹諸國，自由行動，蒲加雷斯特條約不妥，也就可以看過下去。但是他方面之德奧兩國的觀察點，就大不相同。他們在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原來利在保加利戰勝，或戰事延長。但不料保加利倒反被希塞兩國打敗，加之羅馬尼亞中途加入，戰事結束，意外的迅速。蒲加雷斯特和議，利於希塞兩國，尤其是塞爾維亞之在馬塞頓佔優勢，阻礙奧大利努力前進；而且塞國的勝利，足以激動波斯尼亞的分離運動，增長大斯拉夫主義的聲勢。奧大利看見這樣的結果，大抱不安，千九百十三年秋間，至有邀意大利，夾擊塞爾維亞之議。幸而意大利拒絕了他，否則歐洲全局，久已要搖動了。那時候國際關係的危險情狀，可以想見。德國爲奧大利的與國，自然對他表同情。并且他看見巴爾幹半島的勢力，落在斯拉夫人手中，也就和德國的經濟上商業上各種利益，直接衝突。他的外交上權威將墜落，他的東方發展政策，漢堡白格達直通鐵路的計畫，將受阻害。他自然也不能任蒲加雷斯特條約之處置長久有效，而是要打破現狀，別開生面的。保加利之憤而和巴爾幹諸國決絕，依附德奧，是德奧兩國政府的歡迎的。他們在巴爾幹得了這個內應把他和土耳其聯成一氣，對於德奧勢力下，就大可以爲恢復近東勢力的助力。從千九百十三年秋間至於翌年春間，奧大利時常探望機會，

謀攻塞爾維亞。德國爲奧國的後援，並且自己野心勃勃，也想乘機示威，恢復他的權力。而在他方面，則俄國立於塞爾維亞的背後，爲大斯拉夫主義運動的中心，英法兩國，又同屬協商，不免和俄國有連帶關係。危機四伏，識者早知歐洲政局之決裂，不過是一個時日問題。所以卒至千九百十四年就有歐洲大戰，那個戰爭，確不能說是偶然發生的了。

第四章 美國之加入國際政治

講到國際政治，美國在世界上實處於一個特殊的地位。一則以地理上的位置，美國遠處於新大陸，和舊世界在政治上的關係很少。一則美國以一完全新造之邦，既沒有舊式外交的傳習，對於歐洲國家，也沒有深遠紛糾不可解的歷史的爭端。所以美國建國以來，對外關係上，就取消極主義，抱定一個不干涉的態度，這種方針。最初在建國元勳之華盛頓總統退職告別辭中，宣示的極明白。他說美國對於外國，最要少和他們生政治的關係。歐洲有他的種種特殊利益，和美國全不相干，或關涉極遠的。歐洲常有許多爭端，美國儘可不過問。假若美國投入歐洲政治旋渦中，那是最不得策的。美國懸隔的位置，當然使他取一個不同的方針。然則美國又何必自棄其特殊的地位，而干與外事？為甚麼要自己和歐洲某一部分共運命，為他們的野心，為他們的利益盡力，不惜損害自己的平和繁榮呢？美國適當的政策，是在擺脫一切和世界各國永久的同盟關係。華盛頓關於外交政策這

篇說話，恰確定了美國對外關係的原則。他的後繼者，都能謹守這個原則，造成一種傳習。到了孟羅總統發表所謂孟羅主義（一千八百二十三年），美國對外政策的原則，更加確定鮮明了。那時候歐洲的神聖同盟，方以擁護正統主義，干涉革命運動為職志；新大陸的西班牙殖民地，革命獨立運動，有受他們干涉的危險。當時美國總統孟羅氏，受了英國外務大臣甘寧的示意，就在他致國會的教書中，宣示三個原則：後人總稱為孟羅主義。第一個原則美國決不干涉歐洲任何國家的內事。第二是說關於南北兩美洲情勢和歐洲不同，假設歐洲的國家，要把他的政治制度，擴張到這半球的任何一部分，以壓制各國國民，或支配他們的運命，那麼，美國就要干涉起來。第三個原則，是說南北兩美洲，以後再不許歐洲國家，當作殖民地。（但這個原則，是因為同時俄國在美洲西北岸的舉動發出的。）那時候因為孟羅這個宣言，阻遏了神聖同盟的干涉，拉丁亞美利加各國的獨立運動，得以成全。此後孟羅主義就成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在國際政治上，很有權威。

從華盛頓孟羅以後，歷代美國政府，均以專顧美洲，不管外事為宗旨。此種對外消極主義，正能代表美國國民意志，成為國是。在這種主義之下，美國外交活動，大半是被動的。除非是外國勢力，侵

略到美洲來，美國對於世界的事情，是不去干預的。但是這個對外消極主義，雖然成了美國政治的傳習，究竟不能永久不變的。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內外情勢變動，這個主義，就不能一貫的維持下去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新傾向，在薩摩亞(Samoa)事件已經顯出。薩摩亞爲太平洋中之羣島，首先和那島上土王結條約的，是美國；後來英德兩國，相繼和他結約。德國的通商殖民，在那羣島最占勢力，漸次露出武力侵略的勢子。從千八百八十六年以後，美國政府就爲保護那裏美國的利益，和德國起交涉。經過千八百八十九年及千八百九十九年兩次的國際會議，美國和德國劃分地域，問題始告解決。這個薩摩亞事件的歷史的意義，不在最後關於羣島之處分，而在美國漸示干涉外事之傾向；他那時對於原來政治利益範圍以外的半開化人民運命之決定，居然爭起參與權來了。美國外交政策這個傾向，雖是新奇，但亦不是無理由的。南北戰爭所生的善後改造問題，已告解決，一般人民，已不復爲內政忙煞。舊來的政治問題，不復起人興味。國民的精力求向新方面發展。加以美國國內開發，經濟發達，商工業擴張，不得不求市場於海外，因而和外國利益衝突的事漸多。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施行一個積極的對外政策，雖說是和建國以來的政治傳習相牴觸，但實在也是應時勢

的要求，代表國民的新精神的。

美國脫離傳習的對外政策之傾向，經布哇合併（千八百九十八年）美西戰爭兩個事件，更加確定。尤其是美西戰爭，在美國歷史上為對外關係變動的一個大關鍵，對於國際政局，有極大的影響。這個戰爭，雖然起於古巴反抗西班牙統治，發生內亂（千八百九十五年），美國起來干涉，純為一個美洲問題。而其結果，（千八百九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巴黎條約）則美國不單是獲得西屬西印度島嶼，並且獲得菲利濱羣島，美國領土，因此擴張到遠東。美國自建國以來，他的領土，誠哉是繼續的擴張。但是那些領土擴張，都是限於北美大陸，至若到海外拓地的決心，確是原來沒有的。自經美西戰役，獲得菲利濱以後，美國就確然入於海外發展時代。他的對外政策，就不再為消極的，就不再為地域主義所範圍，而要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居一個競爭者地位。從此美國漸漸加入國際政治，二十世紀的國際關係，就具一個新面目，而愈見複雜了。

在美西戰爭的時期中，歐洲列強，正在遠東為擴張勢力之競爭，駸駸乎有瓜分中國的勢子。德國首先藉口山東教案，佔得膠洲灣。俄國繼起效尤，租得旅順大連。隨後英國就租借威海衛，法國租

借廣洲灣、東亞大陸，成了歐洲列強的逐鹿場。他們先以為美國全力用在美西戰爭，不能及時參與中國瓜分的運動，在遠東的權力，當然沒有他的分。那曉得美西戰爭結果，美國取得菲律賓，其利益頗足以抵歐洲列強在中國之所得。有菲律賓做根據地，美國在亞洲就成了一個大勢力，可以控制中國局面，自由發展於遠東。他的一言一動，就能發生影響於東亞國際政局，於是千八百九十九年有所謂門戶開放之有名的宣言。這個宣言，是同年九月六日美國國務卿赫氏對英俄德（隨後對於法意）日本亦發同樣的宣言）發的。赫氏是一個有眼光，有魄力的政治家，他見歐洲列強在中國爭佔所謂勢力範圍，不免要侵害美國的權利利益，釀成爭端。於是要求列強，相約無論在何國勢力範圍內，不得侵害他國既得利益，不得更變現行關稅，至於港稅運貨，對各國人應一律同等徵收。英國首先贊成這種計畫，其他列強，亦不得已一同表示承認。這不能不算是美國外交上的大成功。赫氏此舉，雖為美國利益而起，但其間接影響，有助於中國之保全，也是不可否認的。拳匪事件，美國加入聯軍，在軍事上外交上，也很有重要的活動。和議成後，關於俄國撤兵東三省問題，美國出來干涉，要求俄國定期撤兵。（千九百二年二月美國致中俄兩國通牒。）美國的干涉，雖未能直接發生效

力，迫令俄國實行撤兵，但也大增當時新成立的日英同盟（千九百二年正月三十日簽字）的聲援。挫折俄政府在東亞橫行的氣燄。及至日俄開戰（千九百四年二月），滿洲成了戰場，中國宣告中立，美國復積極的在外交上活動，即時通告日俄兩國，雙方均須尊重中國之中立及領土保全。十九世紀末年以來，列強爭先恐後的在中國占奪勢力範圍，實際已有瓜分的趨勢。自從美國國務卿赫氏發表門戶開放之宣言，美國在東亞外交上，行使種種的干涉活動，對於歐洲列強的侵略政策，居然是一個大阻力。中國之領土保全，無形中得有一重保障。那時候中國瓜分之禍沒有實現，不能不說美國與有大力。所以日俄戰後，美國最得中國信用，在遠東握有一種極大的精神上的勢力，在外交上占一個特殊的優越地位。

美國在日俄戰役，最有力的活動，就是在促成日俄和局。日俄開戰後，俄國海陸軍都連戰連敗，前途沒有希望，日本到了戰爭的第二年，國力也就疲敝，不能久支。盧斯福總統乘時出來調停，（千九百五年六月八日，盧斯福勸告日俄兩國元首講和），於是有玻茲瑪斯的和會。及至和議中間停頓，將要決裂的時候，盧斯福總統又從中調停，卒致和議成功，玻茲瑪斯條約簽字。盧斯福這項舉動，

是對於和平的一個大貢獻，美國在世界的威望，又將因此更增高了。日俄戰爭終結以後，日俄兩國就在南北滿洲各自擴張勢力，不顧門戶開放主義。在那個時候，美國國務卿洛克斯提出滿洲鐵路中立之議，（千九百九年十二月）來抵制他們。美國這個提議，雖然因為洛克斯的外交手段拙劣，全然失敗，但也足見美國對於遠東政局的外交，着着取積極的方針。立於主動的地位。

並且在這個時期，美國外交的活動，不限於遠東方面，就是在歐洲政治舞臺中，美國也大大的活動起來。我們記得千九百五年第一次摩洛哥事件，是經千九百六年的阿爾吉拉斯會議處決的。而在那個會議中，美國居然派有代表列席，並且他的代表在會議中發揮很大的勢力，有助於會議的成功不小。再有一件更大的國際活動，就是第二次海牙平和會議之發起。第二次海牙會議，雖然在千九百七年開會，由俄皇召集的，但是在千九百四年，美總統盧斯福已經提議召集平和會議，不過那時候因為日俄戰事正在進行中，實際不能開會，所以延遲下去罷了。

以上所舉的種種事例，可以表明美國對外政策變動的趨勢，已經由防衛美洲地位的消極方針，進於參加國際政治的積極活動。換句話說，就是從十九世紀末年以來，美國脫離了傳習的政策，

對於國際問題，取一個新態度。這個新態度，在二十世紀中的發展，一面影響於美國的內政，他一面影響於世界政局。那也是極顯而易見的事。

美國對外政策變更，因之內政上也發生新活動。這種活動之最顯著的，就是擴張海軍和建造巴拿馬運河兩事。美西戰爭結果，美國勢力擴張到遠東，海外發展，當然不能不賴有強大的艦隊。所以戰後美政府即着眼於擴張海軍，尤其是在盧斯福總統任內，對於海軍擴張計畫，最爲努力。不到十年工夫，美國由微小海軍勢力的國家，一躍而進於第一流海軍國的地位。巴拿馬運河之建造，也是間接促成於美西戰爭。美國雖久有建築橫貫中美運河的意思，但是不容易決定計畫。及到美西戰爭的時候，美國戰艦往來於大西洋太平洋港口之間，須繞南美洲進行，路程不下萬餘海裡；假若有一橫貫運河可通行，路程可減短不下萬裡。美國人受了美西戰爭的教訓，覺得有趕造橫貫運河的必要。於是千九百一年，英美兩政府訂結關於橫貫運河之協約，解決從前一切懸案，使美國得以自由着手建造。千九百三年，美政府和巴拿馬政府，締結關於運河借地條約；千九百四年，元老院批准條約之後，隨即開始運河建造工事。到歐戰開始前，此橫貫中美之世界的大運河開通，大西洋太

平洋聯成一氣，國際形勢，表現一個大變化。

講到美國對外政策之變動及於國際關係的影響，那是更大了。因為美國之加入國際政治，不單是在遠東形成一個新勢力，和日俄及其他歐洲列強侵略東亞大陸的政策，直接相衝突，並且對於美德兩國的帝國主義，立於勁敵的地位。二十世紀中英德在世界上爭霸，美國則介乎英德兩帝國之間，成一第三競爭者，在國際關係上，有舉足重輕，與齊則齊勝，與楚則楚勝的氣勢。所以在最近國際政局的變動中，美國的活動，實是一個極重要的因子。

第五章 歐洲政局及於遠東政局之影響

中日戰役（一千八百九十四——五年）是遠東形勢變動之一個最大的關鍵。那個戰爭雖說是純然關係中日兩國的事，屬於亞洲內部問題，但其結果，在世界政局上究有很深遠的意義。一方面戰局的勝利，把日本的國際地位提高，在東亞方面忽然現出一個能和歐美列強抗衡的國家。在他方面，則歐美人多年視為不可測度的睡獅，竟不堪蕞爾日本之一擊，至於一敗塗地，把他所有的弱點，一時全然暴露出來，令外人由驚訝變為輕侮，不期對於這個老大帝國都感染指起來。從那時候以後，世界視線漸漸移注到東亞大陸，遠東問題，就成了國際政治上的大問題了。

遠東問題既經捲入世界競爭風潮旋渦中，遠東政局自然不免有隨歐洲政局為轉移的勢力。十九世紀末年，歐洲政局，波浪正多，間接的影響，就牽動了遠東形勢。那時候擾亂遠東政局的發頭人，要推俄德兩帝國。俄羅斯帝國是一個專事侵略的國家，向來抱南下政策的。我們記得他要支配

君士坦丁堡和海峽通路的野心，在柏林會議失敗了。他於是轉而侵略中東，求出口於波斯灣頭，又被英國阻止。英國原來忌刻俄國在近東發展，怕他侵害英國和印度的交通。俄國中東侵略的政策，更見直接危及印度，有關英帝國生死問題，所以英國要竭全力阻他進行。俄國背後，原有德國的慫恿，英俄兩國爲此衝突不絕，以至千八百八十四五年中東問題緊急的時候，至有英俄開戰的形勢。俄政府終覺得前途阻力太大，事業艱危，乃不得不暫斂其鋒，而和英國妥協。但是俄國南下以求出口的宏願，究竟沒有一天忘記。於是侵略方針又一轉，而向遠東進行。東亞大陸之侵略，乃爲二十世紀初頭俄政府主要的政策。那時候促成俄國的遠東政策之施行，有種種原因，可資說明：第一，俄國侵略東亞大陸，前途阻力輕小。勢力本是向抵抗力少的方向進行的；那時候中國在遠東之積弱，更甚於近東的病夫，抵抗力可以說是等於零點。日本雖變法圖強，他的富強實力，尙不足令俄人生畏懼。其他在遠東有利害關係的歐美國家，也都有鞭長莫及之勢，不比在近東地域，歐洲列強，都能隨時以實力阻抗俄國政策的進行。第二，德奧兩國的主使，助長俄政府進行的勇氣。我們記得柏林會議以後，德奧兩國很想把俄國勢力送出近東，使向他方面發展。他們怕俄國繼續經略近東，彼此衝

突，致啓戰端。老獪的畢士馬克正汲汲於得俄國的歡心，常慫恿他別開生面，中東問題之侵略，英俄在波斯阿富汗之衝突，畢士馬克就是構禍的媒介。及至中東侵略失敗，俄政府謀向遠東方面發展，德奧兩國也就樂得有此。俄國有事於遠東，自不暇兼顧近東，德奧就可近東擴張勢力，安然無事。他們這種態度，對於俄國誠是一種敬遠主義，而對於遠東，則不免是幸災樂禍。他們的處心積慮，是有事實可證明的。中日戰後，逼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的，豈不是德法三國嗎？俄國窺伺滿洲，正想據爲己有，不願意日本捷足先得，那是不足怪的。法國正熱心聯俄，自然助俄國的聲勢。獨至德國那時候（千八百九十五年）在遠東尚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而在歐洲與俄國是勁敵，也居然和俄國取一致行動，威嚇日本，甚至被人看做主謀，也就不辭。若不是有意鼓動俄國，構禍遠東，使他成騎虎之勢，很難找出別個理由來。瓜分中國之說盛行的時候，英德兩國之間（千九百年）立有中國門戶開放，領土保全之協商。但是到了俄國滿洲撤兵問題緊急時候，德政府忽然取傍觀態度說：英德協商中的領土保全主義，不適用於滿洲。在這個時候，德國有意袒護俄國，利其猛力經營遠東，其是司馬昭之心，路人共見的。再有一事就是當日俄國交危急，將要開戰的時候，奧國政府急向俄政

府聲明：如果日俄開戰，俄國儘可以全力注於遠東，不須慮及西方國防。德政府也給俄國以同一之保障。那麼，說日俄戰事，由他們兩國間接促成的，也無不可。此外類似的事實尚多，然就上面所舉的看起來，已可以明白德奧兩國，利於俄國經營遠東，暗中爲之主使，把俄國侵略的野心，更弄堅固了。因之俄政府經略東亞大陸，着着進行，再沒有許多顧忌。既租借旅順大連，又乘拳匪事變，佔領滿洲全部，其勢洶洶，大有進窺朝鮮半島，席捲東亞的勢子。俄國這種行爲，搖動東亞均勢，不單是招致英美諸國的抗議，並且引起日本的疑懼，不能不起而爲自衛的抵抗。於是有日俄戰爭，把一個遠東，鬧得天翻地覆；其遠因都是由歐洲政局種來的。

德意志帝國之勃興，也就影響遠東政局很大。這不單是因爲德國慫恿俄國向歐洲以外的方面發展，侵略東亞大陸；並且因爲德帝國發展的結果，自己直接侵略到遠東來。德帝國成立以後，國勢日張，在畢士馬克時代，勢力膨脹，猶只限於歐洲；到了維廉第二時代，就著眼海外發展，有「德帝國之將來在海上」的宣言。垂涎地大物博的中國，久想在沿海省分，獲得一個根據地。千八百九十七年的山東教案，恰恰給他一個侵略的好口實。他就把那件不幸的事，小題大做起來。於是遠遠的

特派一個亨利親王（維廉第二之弟）率領德國艦隊，向遠東進發，佔了膠洲灣，把山東全省當作德國勢力範圍。德皇這種暴舉，直接扶殖德國權力於遠東，間接就開了中國瓜分之端。歐洲列強，大家都來效尤，利用租借名義，來侵佔中國重要的海港。因此，在內就激發中國人的排外熱，致有拳匪之亂，在外就引起列強均勢問題，致遠東政局發生危機。可見德帝國膨脹及於遠東政局之惡影響，比較俄國的南下政策，有過之無不及了。

日俄戰後，俄國一時停止東亞侵略之進行，轉來注目於巴爾幹半島；而其他列強，亦都爲歐洲外交問題忙碌，不暇在遠東爲積極的活動。當時近東多事，千九百八年，有奧國合併波赫兩州問題；千九百十一年，有意土戰爭；千九百十二年，又有兩次巴爾幹戰爭。加之德法關係危急，千九百五年之第一次摩洛哥事件，纔以千九百六年之阿爾吉西拉斯會議了結；千九百十一年，又發生第二次摩洛哥事件，形勢更險。列強全力既注在歐洲大陸，東亞方面就取現狀維持主義。所以從日俄戰後，至於歐戰發生，中間十年，遠東方面，保全一個均勢的局面，表面上可說小康，中國因此也得免於瓜分之危險。

但是在他一方面，有一個日本，在遠東占優越地位，抱著極大的野心，竭力發展他所謂大陸政策。乘列強有事於歐洲的時候，日本就著著在中國實行侵略主義。并且勾結舊敵俄國，劃清勢力範圍，彼此協助，抵制其他列強。千九百七年之第一次日俄協約，已經樹了日俄接近的先聲，千九百十年之第二次日俄協約，更確定兩國在滿洲的勢力，結成共同對外關係。那時候甚至有日俄同盟的消息。千九百十二年，日本有名的軍人政治家桂太郎，有俄國之行，內外報紙，盛傳他帶有極重大的外交使命。後來因日皇逝世，國內政變，桂太郎中途折回日本，沒有履行他的使命。在那個時期中，日本蓄意貫徹他那大陸政策，和俄國妥協，一致對外。其不利於中國，爲遠東政局的禍害，可想而知。

千九百十四年，歐戰發生，於世界爲一個慘劇，而於日本倒反是一個頂好侵略的機會。那時候歐洲列強，全體捲入戰爭旋渦中，正竭力應付戰事，自然沒有餘力顧及遠東。日本就得乘機發展他的侵略政策。始而佔領青島，侵入山東，繼而有千九百十五年二十一條之要求。在東亞有關係的國家，見日本橫行東亞大陸，沒有法子對付，尤其是協商側國家，戰時汲汲於保有日本友誼，更有敢怒而不敢言的景象。在那個時候，日本并且進一步，倡言脫離日英同盟，代以日俄同盟，意在破壞東

亞均勢，操縱中國運命。於是有千九百十七年之第三次日俄協約，並且同時結有同盟條約，付諸秘密。遠東均勢局面，至此全破，中國的危險，真不堪設想了。

在那岌岌可危之形勢中，遠東政局，忽然有一個轉機。那就是因為有俄國革命和美國加入歐戰，那兩個世界的大事變。俄國革命，民黨執權，帝政時代的外交傳習，一掃而空。不單是新成的日俄同盟，登時失了效力，就是俄國本身，也就拋棄了從來侵略東亞大陸的計畫。這已經是東亞政局的一個轉機。而在他方面得美國加入歐戰，也就大可以挫折侵略派的野心。美國這一舉，全然破壞了他那傳習的對外政策。他到這時候居然起來以武力干涉歐洲問題，積極的參加空前的國際戰爭，就不是沒有意義的行動。在東亞一味侵略，倘若無人之日本帝國，處於這個新形勢之下，就不能不覺得自己的勢子，一天一天的孤單，非斂迹不可了。他雖然最後在戰事進行中，尙要挾得一個日美共同宣言，承認他在中國特殊的利益，但這也只能作一個消極的現狀維持手段看，不能發生何等積極的效果。所以到這個時候，可以說因為這種國際情勢變動，東亞方面也就忽然現出一個新局面來。遠東均勢回復，中國一時轉危爲安。

這樣看來，歐洲政局和遠東政局關係之密切，那是很明白的。所以要了解遠東政局變動的情形，究竟非明白歐洲政局一般的國際關係不可。

第六章 歐戰與巴黎和議

千九百十三年蒲加雷斯特議和以後，歐洲形勢更加險惡。德奧和三國協商，勢力衝突，惡感日深，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兩邊都極力整軍經武，以備不虞。俄國大大的擴張常備軍，法國議院通過三年兵役案，德國國會議決特別戰事稅，那真正是殺機四伏。奧國皇儲之慘劇，恰恰做了一個導火線，以至有千九百十四年之大戰發生。那個慘劇，在德國雖說出於意外，但正是一個可歡迎的好機會。他看見協商側勢力一天一天的擴大，而兩次巴爾幹戰爭的結果，德奧勢力在近東大受打擊，就要想找一個機會，捲土重來。奧國皇儲在波斯尼亞被人暗殺，歸罪於大斯拉夫主義運動之陰謀，正可藉肅清禍源爲名，給塞爾維亞一個致命的打擊。直接的結果，可以打通德國經由巴爾幹以達波斯灣頭的通路，便於近東政策之進行；間接的影響，就可以使那以塞爾維亞保護者自任，作大斯拉夫主義運動中心之俄國，在巴爾幹半島失勢，因而減殺協商側的權威。德國要達他的目的，時機似

再莫有好於千九百十四年夏季的。那時候奧國既因為皇儲暗殺事件，對於斯拉夫人之來侵逼，感切膚之痛，自然容易贊助德國的強硬政策。塞爾維亞因為牽入暗殺陰謀，失了各國同情。他那保護者之俄國軍備的整理擴張，方纔著手，應付戰事的準備不足，很不像有決然抵抗德奧的勇氣。俄國既不能積極活動，協商側之法英兩國，更不至於自告奮勇，為塞爾維亞及巴爾幹的斯拉夫人盡力了。加之兩國內部政爭甚烈，對外實力不充。法國軍事行政腐敗情形，纔由陸軍當局自己暴露出來；而英國正有愛爾蘭自治問題之爭執，瀕於內亂，更不像能顧及巴爾幹政局的。根據這等觀察，德國就敢鼓勵奧國，對塞爾維亞取極端的壓迫手段。（奧國致塞國的最後通牒，於千九百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出，限四十八小時以內答覆。）意在把塞爾維亞在巴爾幹戰爭所得的地位，根本推翻，且希望俄國不敢出來干涉，可以兵不血刃，全達目的。即令俄國決然起而干涉，牽率法國，引起德奧對俄法之大戰爭，也就是德國利用兵力，一舉摧破強敵之一個好機會。就甚至於英國加入戰爭，幫助俄法，恐怕也是德政府意中事，已經預備有法子對付的。所以奧國對塞壓迫問題，牽動歐洲全局的時候，種種趨向和平解決的外交調停方法，均為德政府從中破壞。其結果不外出於戰爭之一途。

於是乎息息可危之歐洲政局，終久因奧塞兩國間一個局部的問題，而告破裂。發難的人，就是德意志帝國做了。實則照那時候國際情勢看起來。這個千九百十四年的歐洲戰禍，是遲早要發生的。奧國皇儲暗殺案，不過是一個導火線，並不是戰事的真因。德意志帝國在那時候雖然是一個最大的搗亂的分子，究竟他一國的行動，也不能構成一個國際大戰爭；若不是別有深遠的原因，那個空前的戰爭，也就不見得能這樣的容易發生了。

俄法爲同盟國，俄國對德的戰爭，正是那個同盟的主眼；所以戰端一開，法國當然和俄國取一致行動，那是再沒有話說的。但是協商側之英國，究竟加入戰爭與否，在歐戰當初，還是一個未決的問題。因爲英國對於俄國，並沒有助戰的義務，師出無名，國內非戰派很有反對的理由。及至德國悍然進兵比利時境內，破壞中立，英國政府，乃得毅然對德宣戰，實行援助俄法。德國侵入比利時那種強暴行爲，把英國主戰派的理由，倒弄強固了。破壞比利時中立，就是一個宣戰的好口實，比利時的永久中立，英國和德國都負了保障之義務的（千八百三十一年倫敦條約）。比利時地理上的位置，於英國國防安全，極爲重要，德軍進佔比利時，即可視爲侵逼英倫海岸，就有出兵對待之必要。

因此之故，德的敵人，就不單是俄法兩國，而是協商側全體了。

德國在歐戰初頭，利在速攻。假若能像千八百七十一年普法戰役之進行順利，一兩個禮拜內，把法軍打得一敗塗地，佔有巴黎，結束了西方強敵，再行助奧反攻俄國，戰事就可早日解決；法國就可望於短時期內，獲奏奇功。因為這種軍事上理由，所以德國決計假道比利時攻法，破壞中立，悍然不顧；就令激動英國，加入戰爭，亦所不辭。但不料比利時人的抵抗，意外的強硬，德軍第一步遇著大阻力，遲誤前進之期，反使法國的防禦準備，多得了時日。加以法國抵禦的實力，遠過於德政府所預期的。瑪魯一戰，長驅直入之德軍，忽然大受挫折，一鼓直下巴黎的計畫，全然失敗。德國失去了這個初步的機會，就再沒有速勝的希望。而他方面英國助戰的海陸兵力，漸漸影響到戰局來，雙方勢力平均，相持不下，戰爭就延長下去。於是戰事範圍一天一天的擴張起來，戰局的發展結果，就非德政府始料所能及的了。

戰事進行中，國際政局，生出三個大變動。第一是土耳其加入戰爭，袒助德。奧此事發生於開戰的那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首先砲擊俄國黑海俄鐵薩港），不單是阻害俄國在黑海出路，大

影響於戰局，並且把近東問題全部，牽入戰事問題。第二是翌年意大利（五月二十三日對奧宣戰）加入協商側助戰。意大利本爲三國同盟之一員，論情理當然和德、奧一致行動。然以十九世紀末年以來，意大利已漸和法國親善，而和德、奧疎遠，雖歷次續展同盟，世人早已疑其不復可靠。所以歐戰之初，意大利政府，即宣告中立，目德、奧爲取攻勢者，不適用同盟的助戰義務。兵連禍結，德、奧不能操勝算，彼乃決然應協商側的運動，起而反攻其同盟國，期得亞得里亞海上土地報償。意大利這一舉，使多年在國際政治上形成一大勢力之三國同盟，公然破裂，協商側的聲勢因此大見增加。第二是俄國革命。俄國革命起後，不單是國內秩序紛亂，兵不用命，不能積極的助戰；並且經布爾札維黨奪得政權，就向德、奧單獨講起和來。三國協商，因此去了一員，原來的團結，也就不免受一個打擊。第四是美國加入戰爭。美國輿論原表同情於協商側，及德國施行無限制的潛艇戰，美總統威爾遜，不能再坐視，就居然加入戰爭了。美國加入戰爭，不單是精神上物質上給協商側以莫大的助力，優足以抵俄國落伍之損失而有餘，並且根本的打破美國對外政策的傳習，引起了世界政治全部問題。歐戰意義，因此受了一番變遷。國際政局，就要改換一重關係，具一個新面目了。

把戰時各種事變情勢，通盤打算起來，總是不利於德境那方，尤其是美國加入戰爭，在協商側增了無限資源，德國不單是絕了制勝的希望，連守勢都不能維持下去了。彼猶冀僥倖於萬一，於是最後爲孤注之一擲，而有千九百十八年夏間之猛攻。德軍一時大獲勝利，直撲巴黎，卒以協商側聯軍增援反攻，德軍力盡敗退，一蹶不振。加以他方面近東戰局一變，保加利，土耳其，奧大利相繼降伏於協商。德國在西方戰線，勢不能獨力支持，乃只有乞和之一途。於是千九百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條約簽字，而震動全世界，演盡慘劇，繼續逾四年之歐洲大戰，於此告終。

停戰之後，全世界視線，注在和議。那時候和議的問題，很是複雜困難，在從前一般戰事的和議中沒有遇著過的。交戰國遍於五大洲，戰局牽涉全世界事情。關係各國的利益，互相衝突，等待解決的問題，真是錯綜紛糾，令人望而生畏。那個千九百十九年的巴黎和議，實在是對於千八百七十一以來，造成的國際關係，結一總賬，在歷史上不能不認爲國際政局變動之一個大關鍵的。

在巴黎和議中，德國戰敗求和，成了階下囚，任人魚肉，也是無可如何的。但是在協商側方面，原可希望示一個寬大公平的處分，完全把國際關係，改造一個新局面，爲世界平和，樹一個堅固的基

礎。德國及其與國，均一敗塗地，無防制其復仇之必要；而美國加入戰爭，原是獨立行動，以擁護正義人道爲標幟，正可不爲傳習的國際政治觀念所支配，決然實行他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國際互助之新原則。但是協商側諸國政府當局，全然是頭腦很舊的政治家，慣於傳習的外交方法。在戰爭中，英法意日諸國，已經結了許多祕密約章，爲戰勝分肥的準備。和議一開，他們就好像各人都有既得權利，只要和會對於既成的事實畫諾罷了。在這種情勢之下，和會決定之自由，全被拘束，美總統的主張，有扞格不入之勢。尤其是法國，最難對付。法國一面是戰時受害的苦主，同時又是對於戰爭，出力制勝，佔重要地位之一員。他的主張要求，自然值得同情的考量，並且有很大的權威。他那政府當局，如波安加雷、克雷曼索，一流人物，都是思想很舊的政治家。在和會開會以前，克雷曼索就宣言：主張仍實行均勢主義，不贊成甚麼萬國聯盟，世界新組織。這恰是和美總統的政策，正相反對。萬國聯盟之組織，是所謂美總統十四條之一，他認爲和議之一最重大問題。和議中經了許多討論，始得法國贊成萬國聯盟計畫，放棄對德極端的要求（如合併萊因河左岸等），而締結法英美協約，以爲法國安全的保障。結局對德處分，已屬過分，去美總統提倡的主義很遠。加以意大利南斯拉夫間的休

媾問題，中國、日本間的山東問題，都因為協商諸國，先已祕密有所協定，弄得關係複雜，在和會中成了難題。前者在和會竟不能下一解決，後者勉強下一極不公平的解決，激起中國反對，拒絕簽字。這都是構成巴黎和議大失敗之處。所以自全體說來，巴黎和議的結果，極不滿足，令有心世界平和的人大失所望。各方面對於和議的處分，都失了信仰。破壞種子，散得很多。巴黎和會對於國際政治，原可有除舊布新之功能。乃事實所示，則舊者破壞，新者未興。雖說設立了一個萬國聯盟之組織，算是一個可喜的積極的建設事業，但是布爾札維主義的俄國，不在聯盟之內；德國以舊敵關係，未得加入；美國則以發議組織聯盟之最有力者，而乃因為元老院之不批准和約，反立於聯盟之外，在美國方面，誠不免出爾反爾之譏，而在聯盟本身，也就是一個大打擊。於是則不能不說萬國聯盟，尚帶有一部分的國家團結之色彩，含了舊式的國際同盟之弱點，而去世界新組織之理想尚遠。這樣看來，巴黎和議那個國際政局變動之大關鍵，究竟是變好的關鍵，還是變壞的關鍵？換句話說，究竟國際政局，是從此向新的組織，平和正義的方面發展，還是帶着新的面具，發揮反動的精神，向舊式的競爭軌道上進行？那却是一個未定的問題。